

# Research on Chinese Economy under Globalization: Dialogue across the Ocean

##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 大洋两岸的对话

John Whalley

Yongding Yu 余永定

Tongsan Wang 汪同三

Guoqiang Tian 田国强

Yongmiao Hong 洪永淼

Zhiqi Chen 陈智琦

LiAn Zhou 周黎安

Shi Li 李实

Cheng Wang 王诚

Yang Yao 姚洋

Jun Zhang 张军

Hongbin Liang 李宏彬

Ying Ge Tian 葛赢

Bin Sheng Hong 盛斌

Liutang Gong 龚六堂

Ming Luou 陆铭

.....

The Teahouse for Economists(China) ,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Canada)


www.cigionline.org publish simulatenously in Chinese and English on March 1,2009

##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 ——大洋两岸的对话

本文于2009年3月1日中、英文同步发表

中文版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总第三十九辑 2009.1

英文版发表于：加拿大全球治理创新中心  网站

[www.cigionline.org](http://www.cigionline.org)

如何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这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1995年，林毅夫教授就曾在《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贺〈经济研究〉创刊四十周年》一文中，系统阐述过这一问题。十多年来，随着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应用程度的不断加深，海内外著名经济学家、国内经济学者、留美学生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过多次讨论，《经济学家茶座》也刊登过大量的相关文章。

今天，这一问题又引起了大洋彼岸的一位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 John Whalley 教授的关注。John Whalley 教授是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主要开创者，在国际贸易、可计算一般均衡、公共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研究领域享有盛誉。近年来，John Whalley 教授十分关注中国经济和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这篇文章最初就是源于他与在其政策模拟实验室工作的中国学者之间的一次日常学术讨论。当一些国内学者看到这次讨论的记录稿后，均建议将其发表出来，以期引起国内的经济学者和学生的再次关注。John Whalley 教授担心自己对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现状理解不全面，建议邀请余永定、汪同三、李实等几位与他熟悉的国内著名经济学家进行补充和评论。借此机会，我们还邀请了田国强、陈智琦、洪永淼等海外著名华人经济学家，王诚、姚洋、张军等经济学期刊主编，以及多位青年学者共同汇聚畅谈。

与以往几次讨论不同，本次讨论起源于一位深谙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的谈话，讨论跳脱了早期的“中国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争，在现代经济学语境前提下，探讨了国内青年学者在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泛用模型问题，探讨了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与纯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处理问题，探讨了国内青年学者在全球化背景下从事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路径选择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既有经济学名家的点拨传授，也有知名青年学者的科研体悟；既包括学理的、方法论方面的讨论，也涉及到与学术研究相关的更广泛的话题，下面是一位青年学者在其博客上发出的困惑：

“经过这些年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经历，发现有几个问题需要弄清楚，我自己对其中的某些问题也不太清楚，这些问题不是技术方面的。

- 1、作为一个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和首要条件是什么？——我认为，可能是良好的品德。
- 2、作为一个学者，做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金钱？虚名？推动学术进步？
- 3、作为一个学者，如何去展开自己的研究工作？——追逐热门？个人兴趣？现实中的关键问题？
- 4、作为一个学者，采用何种研究方法？——追逐前沿方法？采用适合的方法？”（吴一平，浙江财经学院）

也许，这篇文章会给跟他具有类似困惑的青年学者和学生一些启发。

## 一、一位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观点

### (一) John Whalley 教授 访谈

#### John Whalley :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国际计量经济学会院士，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欧洲经济顾问组织 CESifo 全球经济研究室主任，加拿大全球治理创新中心(CIGI)首席研究员。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主要开创者，国际贸易、可计算一般均衡、公共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研究领域的资深教授，曾任《The World Economy》杂志主编。

近年来，我一直比较关注中国经济，多次到中国，和政府部门、重要的研究机构、大学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我认为当前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中有一个现象需要引起关注，许多青年学者试图跟随和仿效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但是，北美和欧洲杂志论文里用到的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很多并不适用于直接拿来用于研究中国问题。我的建议是根据中国的情况进行些调整和修正，比如在简单的经典最优化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一些具有中国特质的东西，诸如集体身份认同感、全民所有的生产单位(国有企业)及其它。中国的一些青年学者似乎忽视了中国国情，一味机械地模仿国际杂志上论文的范式。仅仅简单地将新古典主义模型生搬硬套地运用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可能会导致错误。

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部门结构，这与外国的部门结构大不相同。另外的一个特点是身份认同，集体身份认同，而非个体身份认同。我读过一些西方学者写的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供给行为的论文，他们在论文中描述的效用函数是

商品消费和休闲的函数，没有考虑到家庭。而在中国，每个人是在为家庭工作，个人的决策考虑了家庭利益，所以我们在做研究时需要给出家庭的效用函数。西方文明强调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平等自由的价值观，每一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东方的儒家文化强调群体价值，家庭是组成社会的个体单位，儒家认为个体始终处于个人、家庭、社群的网络之中。

如果仅仅将西方的模型不做任何修正的直接套用到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可能会得出有误导性的结论。就我在中国的经历而言，我和不同年龄的中国一流学者有过深入的交流，当我和正居于决策层的一些资深中国经济学家(如六十或六十岁以上)交流时，他们对此现象也忧心忡忡，一些青年学者试图直接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的诸多问题，他们对这些青年学者是否真正了解并能准确解释中国问题持谨慎的态度。所以，我感觉目前正居国家决策中枢的资深经济学家和青年学者间可能存在很大的认知差异和知识结构上的代沟。青年学者希望未来几十年间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能更快速地向西方靠近，但如果忽视了对中国现实的关注，这可能会有些问题。

有一些中国青年学者重视钻研模型技术，而不太关注中国经济。据我了解，可能是因为目前在中国，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是专业晋升中很重要的条件。一些青年学者认为，在其学术研究生涯中最重要的是在北美和欧洲的杂志上发表论文，提高国际排名，以取得职业晋级，而国际期刊通常没有关注中国经济的特性。在政治科学中，美国政治和加拿大政治是不同的课程，因为各国的政治制度是迥异的。在经济学中，通常将马达加斯和法国、美国按相同的研究方法来处理。但是，应该在经济学研究中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特点，在我看来，这一点对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尤为重要。

近三十年来，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技术来进行政策分析一直是我的研究方向之一。我们应该更重视文章的思想性，而不是模型中有多少个方程，以及方程结构的细致程度。此外，对于数值模拟得出的结论的应用要审慎，这些结果是参考性的，而不是精准的，不能直接精确地用于政策决策，而仅仅是提供适当的方向性的指导。

美国金融危机促使西方经济学者加强了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关注，我想，这对中国学者或许也会有些启示，特别是对于中国的青年学者而言。

(以上文字稿源自 2008 年 10 月 16 日下午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经济系，John Whalley 教授与在其政策模拟实验室工作的中国学者的一次随意学术聊天的记录，基于对中国的经济学科发展的关心，John Whalley 教授接受了中国学者的提议，同意将上述聊天记录发表出来，并建议能邀请一些中国的学者对此问题进行补充，以免自己的观点有偏颇。)

## (二) 几位学者对 John Whalley 教授观点的补充和评论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汪同三：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李 实：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

张顺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学特聘教授，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访问教授(2000.9-2006.9)

王一鸣：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金融系副主任

陆 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世界经济文汇》编辑

郑兵勇：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蔡跃洲：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余永定：

我和 John Whalley 教授是老朋友了，我们就此问题有过一些交流。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领域，照搬外国理论的情况很多。但是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者，情况稍有不同，由于通常以问题为导向、为政策服务，所以这个问题相对而言不太严重。相反，我们在利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工具进行分析方面，还是做得不够。

汪同三：

John Whalley 教授和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数技经所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合作。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现代经济学的大多数理论依赖的自由市场等假设与中国（甚至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现实有较大差距。在用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时，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改造。既不要因为它同中国经济现实的较大差距而全盘拒绝，也不要因为其理论框架的成熟完善而直接照搬。

就数学的作用而言，它作为一种工具，对经济学的基础性作用是不可否认和忽视的。马克思、恩格斯等都分别强调过数学在各个学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经济学当然也不例外。马克思认为：“一种学科只有在成功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恩格斯在辑入《自然辩证法》一书的一则札记中写道：“数学在一门科学中应用的程度，标志着这门科学成熟的程度。”尽管数学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工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必须明确的是经济学终究不是数学。数学作为工具是为经济学研究服务的，在经济学研究中数学工具的使用应该以有利于解释现象、解决问题、阐述观点为原则。

李 实：

John Whalley 教授与中国几代经济学家都有交往。在上世纪 80 年初来中国访问时结识了浦山先生，后来两人成为挚友；80 年代中期曾邀请赵人伟前去加拿大西安略大学作学术报告；近几年他接受了多位国内中青年学者到加拿大学习、进修、做合作研究，我所熟悉就有岳希明、辛贤、张顺明、刘晓昀等。从 2005 年开始他与和我一起主持“IDRC/CIGI 中国青年学者贫困研究网络”项目，其主要任务是培养国内青年经济学者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研究中国的贫困、收入分配、劳动力市场等问题，三年下来该项目已资

助 20 位青年学者。通过密切的合作，我对他有了更多地了解，明显感觉到他对中国学者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关爱。他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寻找各种资源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帮助中国学者提高研究能力都是出自真心的喜欢，而不具有任何的个人功利性，这是让我非常钦佩的地方。

据我所知，对国内部分经济学者（不仅仅青年学者）只注重分析技术，忽视问题重要性。对这一倾向的担忧，在国外学者中不止 John Whalley 教授一人。牛津大学的 John Knight 教授也有同样的看法。他曾提到他一次去非洲访问，看到那里的博士生们虽然熟练地掌握了最新计量经济学分析工具，但对本国的经济问题没有什么感觉，在英国的一些中国留学生也有同样的问题，这样下去他们很难成为好的经济学家。我认为，John Whalley 教授对国内青年学者的提醒非常及时，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也经常告诫我的学生，在读书期间多学一些分析技术是必要，要做到有“一技之长”，但是不可以把分析技术看成万能的（当然没有现代的分析技术是万万不能的），它只是做出有价值研究成果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当我们把中国经济作为研究对象时，对中国国情的全面认识和深入理解是必不可少的。我认为，对中国经济现实的理解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经济实际状态、运行方式的熟悉，二是对统计资料的熟知，三是对经济政策和制度的认知。在一定意义上，“理论联系实际”并不是一句空话，特别是我们接受的理论大都是“舶来品”时，不可不重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匹配性。

张顺明：

我跟 John Whalley 教授学习、合作研究多年，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Whalley 教授从 1980 年代开始访问中国研究中国经济，他对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教学研究有很好的了解。他一直强调要用经济理论研究当代中国经济重要问题。

中国需要独特的经济学吗？我们探讨过这个问题。2008 年 5 月加拿大全球治理创新中心（CIGI）和厦门大学还联合召开这个专题的小型研讨会。Whalley 教授认为我们是用经济理论研究当代中国经济的经济政策，不涉及到是否需要中国经济学。

关于可计算性一般均衡，Whalley 教授是奠基人之一，他是 1970 年代初开始用 CGE（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研究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经济的。中国在这个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国务院发展中心的李善同教授。用这种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政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大多数年轻的中国经济学家对这个内容理解不够好，一是对经济理论掌握得不够好，二是数理基础不够扎实，所以应用起来经常出问题。我认为我们要加强培养中国青年学者，好好研究中国经济中的重要问题。

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特别是 SSCI 检索的杂志)上发表论文越来越难，我们应该强调和重视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说明你的论文被国际上学术界的认可，当然应该是职称晋升的标准；国际上排名好的大学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我们为什么不呢？我们应该有一部分学者做出高水平的研究中国经济的论文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

问题是中国很大一部分学者不作这种国际学术标准的研究，他们一直盯着国内的《经济研究》等杂志，不求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也就不会作国际上认可的研究，也不会指导学生作这种研

究。结果他们往往把标准定为在国内杂志上发表论文，有的还排斥国际学术期刊。特别地，国内的考核是要每年算分的，在国内杂志上发表论文的很容易，这样可以评先进、升职称；另一方面，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既难又慢，显然处于不利的境地，你完全可能三年没有一篇论文发表。应该怎么办？我们可以学一学国外，用五六年的时间作为一个考核期；如果你六年的时间里还没有发表论文，我不能说你很弱，但是我可以说你学术上不够强。

王一鸣：

我和 John Whalley 教授是在 2000 年认识的，此后我们就一直保持联系。Whalley 教授研究的经济问题很广泛，他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他尤其在公共财政、国际贸易、WTO 协议等领域研究突出和著名。他非常擅长使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方法进行经济政策及其效应评估研究，他的研究很注重经济学理论含义而不在于精细的预测，比如说他的一些文章出人意料地给出与现有经典文献结论不一致的研究结果，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也反映出他的理论功底很深厚和经济学感觉极佳。近些年来，他越来越对中国经济问题感兴趣，每年都要多次来中国的北京、上海、厦门、四川等各地调研和学术交流，已做出了大量有针对性研究并部分已在国际经济学术刊物上发表出来。因此 Whalley 教授是一个既娴熟西方经济学，又比较了解中国经济问题和中国经济学者的研究风格的人，他关于中国经济学者研究出现的问题的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我非常赞叹 Whalley 教授对中国经济学者研究中所存在现象的敏锐观察。对他提出的问题，我也给出自己的几点看法：首先，我们中国经济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应该注重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其

次，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方法上，我们可以也应该借鉴西方经济学使用数理模型研究的范式，但在借鉴过程中要注意该模型是否适合我国的情况，即其假设条件是否成立或是否过于简化抽象，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不完全适用于研究中国问题，此时可根据中国的情况进行调整和修正，不能忽略可能起关键性影响的中国特有因素变量或部门。但有一些模型，尤其时间序列模型，还是基本上可以照仿进行变量或变量间动态分析；第三，在数据处理上是至关重要的，包括数据变量的定义或界定，比如说边际成本里到底应包括哪些部分。数据如有问题很难想象其结论是可靠的，而这方面我们很多人则显得更加随意，当然这有在国内数据获取困难或所获取数据质量不佳的原因。还有，很多模型里涉及的系数，在国内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果或严格的确定，这对我们研究造成困难。

我认为，如果我们在模型处理中注意中国因素、模型条件的成立或近似成立，再加上数据处理得当，是可以很好地用来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研究，这也是经济学研究的方向。另外，我们在反对西方数理模型随意套搬的同时，也要防止在没有数据和模型检验的前提下，轻率地凭教科书上经济学理论给出结论或建议，抽象空谈经济现象和政策也有像随意搬用数理模型一样照搬西方东西的危险。

陆 铭：

关于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多年前，Dwight Perkins 就曾撰文，以他在韩国的类似经历提醒中国学者，要小心地用既有的经济学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实践，以及中国的经济研究。John Whalley 教授的评论有异曲同工之处。我参加了 Whalley 教授和李实教授共同主持的“IDRC/CIGI 中国青年学者贫困研究网络”，和他有过很多次交流。Whalley 教授谈话中体现出来的一些想法，是非常需要给国内的青年学者们了解的，特别是当这些问题由对构建模型有深入了解的一位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提出，可能会更有说服力。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首先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的方法来记录历史，把中国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事情讲清楚。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拥有的经济学知识不适用于中国，恰恰相反，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可以解释中国事实的很多方面，但也肯定不是全部。中国特定的历史和现实条件构成了人的行为（及其结果）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比如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基于家庭的社会资本，还有户籍和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对于这些结构性特征的正确把握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结构性特征与既有经济学理论的嫁接能够给中国的事实提供更为准确的解释。等中国的事情讲清楚了，也许在整整一代人，甚至更久以后，那时的经济学家将能够更为科学地总结中国所走过的道路，及其对经济学理论的一般含义。当然，前提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所走过的道路是可持续并且可以被借鉴的。

中国的发展体现出了发展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互动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恰恰是既有的经济学理论所缺少的，只是在最近这些年才越来越被重视，这其中，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需要做。中国的学者们除了要发表论文以外，真正的懂得中国经济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

郑兵勇：

我跟 John Whalley 教授也谈起过这个问题，不过在我看来，他这种担心是太多余了。John Whalley 教授是我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读博士时的老师，在读博士的几年中，我就经常跟他聊，谈自己的研究，也谈中国经济，几年下来，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他对中国问题一直很热心，每年都会到中国来。2008 年两次到上海，他都到上海财经大学来，他和我谈了很多中国经济问题，让我受益匪浅。

记得每次跟他谈起我自己的研究时，Whalley 教授都喜欢说一句话，年轻的经济学者都喜欢也应该做些技术性比较强的研究，以展示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只有这样，你才能得到学术圈的承认。但等到自己在这方面已有所成就，就喜欢做一些比较简单但思想性强的研究。这个时候，由于你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名气，你的研究也很容易被别人接受。在我看来，Whalley 教授的这个建议也应该同样适用于当前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青年学者。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学术界对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了解还很不够，因此在现阶段，鼓励年轻学者多用西方经济理论和实证方法发文章，未尝不好。这就像中国现在一些已经做得不错的工业，比如汽车工业，航空业，先模仿别人，再搞自主创新。只有第一步成功了，才能站稳脚跟，才有资本搞自主创新。如果没经过模仿阶段，就谈自主创新，那不就如同初生婴儿，爬都不会就要他跑一样了吗？

回国这两年来，我也听到不少批评，认为我们这些海归学者都只顾在国外发文章，不研究中国实际问题。实际上，不是我们不想研究中国问题。说实话，我们很多人包括我在内，不管研究方向是什么，从来都没有放弃对中国问题的关注。中国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我们现在就集中精力研究中国问题，实际上也不能做出太大的贡献。

第一，这些问题都很难，不是简单套用西方经济理论就可以解释的，对我们这些博士刚毕业没几年的人来说，这些问题更加困难。虽然我们在国外大学受过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系统训练，但就研究能力来说，我们当中很多人还处于最初的学习阶段，对大问题难题的把握能力还不强，要想一下子独立解决很难的问题不太现实。因此，还不如先发几篇文章，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

第二，在学术界，要想让别人接受任何与主流思想不同的东西，并不容易，对于年轻学者来说尤甚。目前中国很多年轻学者的学术能力还远未被别人接受，还处在 Whalley 教授所说的第一阶段（年轻时候），人微言轻，即使自己的研究很有新意，也很难引起别人注意，让人接受。如果你的研究不被人接受，那也难有太大贡献。对于年轻学者来说，要让学术圈认识你，了解你，只能通过发文章来实现。当别人已经认识你，知道你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你的一些结合西方经济理论和中国实际的研究也才容易被人接受。

蔡跃洲：

我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做博士后期间，和 John Whalley 教授合作了三篇论文。他开阔大气的视野、对经济问题敏锐的洞察力和对经济学精髓的把握，让我大开眼界。在跟随 Whalley 教授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Whalley 教授在可计算一般均衡技术、数学模型、以及经济学方法论等多方面给予我耐心的指导和帮助。在他的教导下，我对数学模型在经济学研究，尤其是现实政策性研究方面研究中的定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包括可计算一般均衡、经济计量等在内的模型，都是对研究对象的抽象。基于模型得出的结论很难做到准确，但可以提供方向性的参考；数学仅是经济学研究的工具。在运用数学工具时，只有当边际增加的复杂性能够带来边际上更多



更好的对于现实的刻画时，才是有效率的。如果能用简单数学说清楚的问题用简单数学即可。

事实上，Whalley 教授的研究正体现了上述风格。作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领域的大师，Whalley 教授并不推崇过于复杂的模型，而更强调文章的思想性。经常可以看到他从简单模型出发，针对现实问题所进行的精妙应用。近几年，他还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研究了很多重要的中国问题，如人民币升值、贸易不平衡、户口制度、增值税等，很多处理非常巧妙。Whalley 教授也很赞赏 Krugman 教授的研究风格，认为他的模型虽然简单，但非常有说服力。

此外，为什么要关注中国经济问题，我们几个和 Whalley 教授一起工作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认为，除了 Whalley 教授所提出的模型适用性等技术方面的原因外，另一个原因是研究者自身的学术方向选择。Whalley 教授认为研究中国的劳动者供给行为时应该建立家庭的效用函数，但如果对中国经济学者进行研究，可能还需要做些修正，因为除了对个人和家庭的责任外，一些中国经济学者还考虑了对国家的责任。很多老一辈经济学家具有牵挂民族、心系苍生的胸怀，他们立足中国实际，研究中国问题、寻找中国道路，老一辈经济学家的学术报国理念值得我们学习。

## 二、海内外经济学期刊主编纵横谈

田国强：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TAMU）经济系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China Economic Review》，《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共同主编（Co-Editor）

陈智琦：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经济系教授，厦门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美国《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rategy》共同主编（Co-Editor）

王 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研究》副主编、编辑部主任

姚 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季刊》主编

张 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世界经济文汇》主编

何 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世界经济》副主编

田国强：

当前，中国经济学科正处于迅速发展阶段，这与 20 世纪 40-50 年代现代经济学在美国初期发展时的状况有些类似。对于现代经济学，国内经济学界存在着两种极端的看法：第一种是基本否定现代经济学的作用；第二种是泛用模型，即不考虑由中国实际情况与经济制度环境所决定的约束条件和边界条件，将一个经济理论或模型泛用到中国现实问题，简单地套用，而不管这个理论模型的假设与中国的经济现实和制度环境是多么的脱节。

John Whalley 教授在他的谈话中重点强调了第二个问题，即泛用模型问题。对于此问题，我同意 John Whalley 教授及参加本次讨论的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我想强调的是，在重视上述第二种倾向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另外一种倾向，即否认现代经济学的作用。消除这种倾向也非常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因为完全否认现代经济学的作用可以说是犯了方向性错误。现代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在市场经济制度环境下人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一门学科，有着一整套的基本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并发展出了许多分析工具。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体制转型的取向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从而掌握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就显得非常必要。而泛用模型则是方式和技术问题（当然也会造成很多，甚至是非常大的问题和失误），但大方向是对的。就像小孩学大人讲话做事，尽管不是这么一回事，或像年轻人做事还不熟练，但只要坚持下去，就会越做越好，没有太多担心的必要；就像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一样，只要大方向是对的，存在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进一步深化市场改革解决的，但改革方向一旦错了，一切都没有戏了。所以，我们应该防止那些用中国经济问题的特殊性来完全否定现代经济学作用的倾向。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分析原理、研究方法所提供的许多分析工具是无地域和国界之分的，可以用来研究不同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安排下的各种经济问题，当然也可以用来研究中国经济制度环境下的各种经济问题。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sup>\*</sup>一文中，我详细的阐述了这一问题。所以说，对于青年学者和学生而言，无论是做纯理论的研究，还是做中国问题的研究，首先要掌握好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理论和分析工具，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创新，将其本土化，并使之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真正对中国经济及其体制转型做出了让人信服的研究的经济学家，正是那些真正掌握和熟练运用现代经济学基本研究方法和原理的人。

其次，我想谈谈如何看待某些经济理论结果与现实脱节的问题。由于现代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是研究西方发达国家中的一些经济现象而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往往隐含着一个基本假设，即市场经济

制度环境是相对完善的。尽管这些理论不适宜直接描述当前中国经济制度环境，但是却从不同的角度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取向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努力的目标。这样，许多现代经济学理论也就为我们研究各种问题提供了一系列的参照系和基准点(benchmark)，让我们知道了努力的方向，以及现实和理想状态之间的落差。从而，我们在研究偏离了理想状态的现实问题（如信息不完全，不完全竞争，外部性等市场失灵现象）时，需要对所提供了参照系和基准点的经济理论进行适当的修正，并与之进行比较，大多现代经济学理论也都是如此发展和成熟起来的。不少人正是对于这种研究方法没有很好地理解，从而导致了认识上的误区。

由于上述原因，一个一般的经济理论往往会与某国、某地的现实脱节，但在应用上，则必须让所应用的理论尽可能接近现实，或发展出新的理论来解释或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否则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后面还会谈到），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在人们思想水平不高，大多都追求个人利益的情况下，需要采用市场经济制度来协调经济人之间的经济活动。那么，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建立现代市场体系，在这一前提下，我们首先要弄清各类改革的子目标和结果应该是什么。但要注意的是，目标不等于实施过程。提出目标是回答应该做什么的问题；而实施过程则是回答怎样做才可以达到所提出目标的问题，也就是需要弄清楚如何改革和怎样实施的问题。这首先需要充分考虑到可行性、可操作性，也就是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现实，即在各种约束条件下给出（过渡性）制度安排，这也符合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在约束条件下，进行取舍和选择。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在解决现实问题时，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而，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和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时，就需要对提供参照系和基准点的现有理论进行修正。但不管怎样，分析问题的框架和研究

<sup>\*</sup> 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经济研究》，2005年2期。

方法都是一样的，并且不少分析工具（如：供给需求基本模型、博弈论、委托代理理论、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等）都可以用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和现象。现在还有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特别是青年学者和学生对这个问题总是感到迷惑，一个原因就是现代经济学缺乏良好的训练，这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改变这种现象。

再其次，在解决经济问题时，我们不可能拿社会做实验，因而在做现实问题研究，应用某个经济理论提出政策性建议时，需要非常慎重，注重理论结果成立的前提条件，因为任何一个理论都有它适用范围，即边界（先决）条件的。只有将经济现实环境充分地把握住，才会通过经济理论（也许需要发展针对相应问题的新经济理论）得出符合逻辑而又切合实际的结论。只有对所涉及到的经济学基本理论有一个较好的掌握，充分注重或弄清楚所应用的经济理论结果成立的前提条件（具有良好技术性训练的海归在这方面有较大的优势。因而从某种程度来讲，对中国问题把握较好的本土学者与海归学者合作进行研究，也许会产出更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才有可能确保所提出的经济政策应对得当。否则，一个政策建议不当，会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后果。比如，这次美国由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政府的官员和美联储的经济学家忽视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简单的先决条件，即忽视了金融行业的巨大外部性（传递性），放松了金融监管，导致机会主义者疯狂逐利，从而使得市场泡沫不断膨胀直至破裂。

再比如，国内对于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把握和应对就很有值得探讨的地方，为什么在去年上半年和下半年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所采用的宏观调控政策完全相反？并且正反两方面政策力度均是如此之大？这说明在理论指导方面还存在较大欠缺。在判断经济形势和预测经济景气这类政策性研究时，不能够只看重经济数据。数据在许多情况下对短期预测和检验理论当然有用。但经济数据在有

些方面，如在预测经济景气的情况下，可能有它的局限性。那么，一个政策怎样才能具有前瞻性呢？靠什么来让我们得出事前的结论呢？这就是经济理论的逻辑技术分析。也就是说，只要将经济现实环境充分地把握住，就会通过经济理论得出逻辑的结论。例如，我和曾担任过美联储高级经济学家的黄晓东教授早在去年6月份写的《治理通货膨胀，更要警惕经济大幅下滑风险——关于解决扩大内需和抑制通货膨胀两难的政策建议》一文中，通过经济环境所具有的三大成因，得出了经济大幅下滑的风险正不断累积这一结论，提出了“慎紧缩、稳股市、拉两头、控中间、停升值、缓提价”等六大综合治理措施。以上两个例子都说明了经济学基本理论的重要性。因此，加强基本理论的训练和分析工具的掌握，就显得非常必要。不仅如此，我们也应该有一大批中国学者瞄准国际研究前沿，在理论创新和提供分析工具研究做出贡献，在具有共性的研究方面具有话语权。只有这样，中国学者才能受到国际同行的尊重，研究的成果才会得到别人的重视。

下面，我想谈谈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以及中国青年学者的国际化道路的探索的问题。

过去十年多来，国内的经济学研究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国内的期刊如《经济研究》在引导国内经济学研究与国际接轨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上面刊登的文章大多写的比较规范，很多都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及分析工具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不过，与国际研究水平相比，国内的经济学研究还是有相当的差距。如果我们将国际刊物和国内刊物发表文章的归类来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纯理论的创新，具有共性的基本理论研究，这些理论结果没有国界，具有一般性，如博弈论、信息不对称时的委托代理和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等。在这方面，中国的研究水平和国际相比差距很大，这些差距体现在原创性、发表论

文数量的差别、研究方法、以及文章中体现的经济思想的差距。很多技术性很强的文章，其实也可能在其中包含很多经济思想，模型背后体现的是深刻的经济学思想（如一般均衡理论、信息经济学、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等）；第二类是现实问题的研究，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来研究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现实问题。在这方面，研究本国问题当然占大多数，而研究国外问题占少部分。而中国经济学期刊基本只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问题，如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等。这方面，中国的经济学者有着独特的优势，虽然有很多国外的经济学家对中国问题很感兴趣，但是他们研究中国问题时没有优势，我没有看到外国学者对中国经济问题有过什么像样的研究。

其次，国际刊物和国内刊物在选择稿件时的偏好（也许是客观原因造成的）也是有所不同的。国内的刊物侧重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而不太注重（也可能是由于对现代经济前沿了解不够，很难做出）现代经济学纯理论方面的创新性研究。国际期刊以美国经济刊物为例，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最注重的是—般性理论问题的研究，如博弈论、信息经济学、信息不对称时的委托代理理论和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组织理论、产权理论、或针对某个经济现象给出理论解释等。也有一些是为建立参照系和基准点而发展出来的理论，这些理论假定比较理想的经济环境，如信息完备，零交易成本或市场经济制度规范，离现实较远；其次是对美国经济问题的研究；第三方面是对他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如中国经济问题。我们看到有一些学者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如钱颖一等都作出了很不错的研究成果。一些国际刊物，如《China Economic Review》等也非常关注中国经济问题。

关于中国青年学者的国际化问题。我认为对于本土学者来说，首先应该进一步加强对现代经济学理论工具的学习和掌握，其次要发挥自己对中国经济具有较好把握和了解的优势。此外，应该有开放的心态，通过合作的方式，进行国际化拓展，如既可以和国外学者合作，也可以和海归学者合作，来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成果质量，实现双赢。对于海归学者而言，在国内和国外的工作环境相比，国内工作带给他们的优势，就是身处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大环境中，对中国现状比较了解，所以做中国经济问题有比较优势。不过，我并不认为，所有的海外学子毕业回国后就立刻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现实，老一辈经济学者有很好的把握，很多海归青年学者虽然接受了系统的现代经济学训练，但由于对中国现实把握不够及认识不深，回国后立刻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只是进入经济学研究这一终身事业的门槛，初出茅庐的海归博士往往对中国现实问题把握不足，对经济理论的训练和掌握也不够，不太可能提出深邃的经济思想，做不出什么高质量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并且，由于名气不够，即使做出了较好的研究也不大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从而不利于个人学术生涯的发展。我个人是做纯理论研究的，直到拿到终身教职几年后才开始做中国问题研究。我看到不少刚毕业时非常优秀的青年经济学者由于没有将内功练好（理论功力及把握现实的能力不足），就立即进行中国问题研究，往往没有什么后劲，加上国内经济学研究水平的迅速上升，新人辈出，让人感觉这些人所做的研究越来越差。

总之，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在国内做研究的优势就是对中国的现实国情具有切身和相对深刻的认识，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具有近水楼台之便。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在国际经济学界会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同时，为了让中国的经济学研

究与国际接轨，让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及其成果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掌握经济学研究的话语权，我们也需要有相当一批人瞄准国际前沿，做纯理论问题的研究，而不单单是做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所有这些，都需要青年学者学好现代经济学，掌握其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注重培养自我学习，知识自我更新的能力，在博士毕业后仍需要加强学习，培养出可以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能力，由于人生学术生涯有好几十年，当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一定的学术积淀之后，进而再去做一些政策性问题研究也不会太晚。

陈智琦：

我认为 **John Whalley** 教授的谈话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方法，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如何看待中国一些高校中的青年经济学教授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完全同意 **Whalley** 教授的观点。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应该注意到中国经济的一些特质，并将其纳入到研究的分析框架中。**Whalley** 教授对中国经济的一些重要特点，如集体身份认同感、国有企业等的观察是非常有洞察力的，这体现了他对中国经济的深入了解。然而，我想补充的是，将中国经济的这些特征纳入分析框架，这不仅仅是对中国青年学者的挑战，而且是对所有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的挑战，不论这些经济学者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和 **Whalley** 教授的观点不同。我认为，中国青年经济学教授致力于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是一个好现象，而无需担心。尽管我认为对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和参加政策讨论是经济学者的任务，这个角色通常由更有经验的经济学者来承担，他们可以超越单个模型而对整个经济做出全面正确的判断，而年轻学

者容易拘泥于个别模型，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我并非倡导青年学者不做政策研究，但我认为，总体上看，如果多数青年学者专注于追求知识（如学术研究），他们所掌握的学术前沿的知识和技能将被更好的得以应用。从这个角度看，事实上，中国学者在做严谨的学术研究的能力方面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与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制造业部门令人惊异的现代化速度相比，中国经济研究的现代化进程相当缓慢。虽然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研究中已经很普及，但是从严谨性和尖端性看，中国的研究成果的平均质量仍显著低于国际标准。正如与国际市场的接轨极大的提高了中国的制造能力，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思想界参与国际竞争，如致力于在国际期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将加速中国经济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基于这个原因，我赞同中国的一些一流高校已经采取的措施，为青年经济学教授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提供条件和激励。

王 诚：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经济建设成绩令世人瞩目，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断遇到严峻挑战。在经济学界，如何看待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实践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论。而这也正是 John Whalley 教授所提出的问题。

John Whalley 教授的言论背后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是研究者的自由探索精神。如果说传统社会的自由探索学者主要受到食不果腹的困窘和专制政权的随意压制和迫害，那么现代社会学者的自由精神则主要受到流行思维规范、主流期刊标准、基金会导向、职业阶梯压力、中产阶级生活攀比和一定的行政升迁机会等因素所奴役。今天的经济学，有一部分是自由探索的结晶和精华，也有一部分是自由探索的次品，更有一些在各种奴役压力下产生的结果。中国的学者，有责任分清经济学中的精华、次品和奴役品。学问在本质上是“兼济天下”的公共产品，但真学问产生的必要前提是学者精神上的“独善其身”。

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注重形式之美，强调科学化和规范化，它在简单的假设和公理基础上，借助一套界定良好的概念，通过抽象化和逻辑的推理，建立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发展的任务就是在这个体系中不断进行修补和完善，而不要走出这个体系到现实中去。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这套理论体系也充满争议，而由这套理论体系得出的政策建议也经常在实践中碰壁。经济学的“科学化”，仅仅在“科学是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过程”定义上是正确的。如果把经济学的科学化理解为对经济现象研究的封闭化、单一形式化和数学化，则可能陷入误区。作为经济学者，除了知道常用的分析工具以外，了解经济社会学、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是必不可少的。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物理学和化学从来不需要一门“物

理现象史”或“化学现象史”，也不需要“区域物理学”或“区域化学”，但是对于经济学而言，区分经济现象的历史时间和地域空间特征及其特有的规律性则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关系更加复杂的发展中大国，直接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片面强调经济学的所谓“科学化”，无疑是不可取的。

对于中国的学者来讲，通过低水平重复生产而制造出大量经济学次品的一个原因，是在经济分析中尤其是在宏观分析领域经常出现的感受性分析或者散文式研究风格。这种研究挥洒作者的思想 and 联想，但是却缺乏严格界定的概念，论述主题不集中，没有严格一致的逻辑框架。尽管这种研究也可能包含某些真知灼见的“一闪念”，但是其对于知识积累、学术进步是不利的，是严谨的学者所不应提倡的，因为这种“研究”像其他无效的劳动分工一样，会严重浪费我们本来稀缺的脑力资源。

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模型的优劣最终要依赖于其解释现实世界的的能力。对于经济学者来说，总结、提炼典型化事实总是第一步的工作。例如，宏观经济分析中著名的“卡尔多典型化事实”在西方经济学界具有长期影响力，直到今天美国的宏观经济数据也基本符合“卡尔多典型化事实”。但是众多研究却发现，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却有很多与卡尔多典型化事实相异的经济现象。其原因可能是东方经济社会的一些特殊却可能是积极的因素，如 Whalley 教授提到的家庭因素及其儒家文化的影响。对于中国的经济学者来说，基于中国实践的典型化事实的研究和发现还远远没有完成，这是一个复杂而又富有研究价值的任务。只有在不断积累典型化事实的基础上，同时更多地借鉴关于经济发展过程的“库兹涅茨典型化事实”和“熊彼特典型化事实”，才可以进一步得出一般理论模型和真实理论，从而为中国经济理论体系的建设，也最终为世界经济理论体系的宝库做出贡献。

姚 洋：

John Whalley 教授指出现象，的确是国内经济学界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办《经济学季刊》的过程中，我收到许多青年学者写的理论文章，多数都被匿名审稿人拒绝了，理由往往是，“本文只是对某某文章的假设做了改动，不过是一篇习作而已。”这里涉及一个根本性的方法论问题，即经济学是一门演绎（deductive）学科，还是一门归纳（inductive）学科。写在教科书里的经济学理论很严谨，而且采用的是演绎的方式写出来的，学生们因此也就认为经济学是一个演绎学科，以为只要写出一个模型，模型的结论自然就是正确的。但是，经济学的目的不是推演和预测，而是归纳和解释。经济学研究的进路应该是先观察，归纳出具有普遍性的结论，然后从经济学的原理出发，给出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可以是基于一个文字模型的，也可以是基于一个数理模型的，但最好是后者，因为文字模型依赖自然语言，难免有漏洞，而数理模型严谨，不会出现逻辑错误。但是，许多青年学者没有前面观察和归纳的铺垫，截弯取直，直接进入数理模型这一步，形似高雅，实则空洞。

青年学者的问题，是我们经济学教育的问题。我们的许多教师自己就没有用现代经济学研究现实问题的经历，经济学教育往往变成照本宣科。这可能是经济学的尴尬所在。和其他社会科学不同，经济学使用严谨的数理模型解释世界，因此需要经济学家同时掌握现实和理论工具，如果火候不到，经济学家就会变成半生不熟的半吊子。在这方面，本科阶段的教育更为重要。本科生刚进入社会，对现实没有感觉，经济学教育的目标应该是教学生如何观察世界，如何把现有理论和现实结合起来，简言之，就是培养学生的经济学直觉。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自己虽然教了多年本科生，但也不能肯定把经济学直觉教给了他们。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自己不做理论联系实际研究的人，绝不可能把经济学直觉

教给学生。

青年学者的问题，还和国内缺少经验研究基础有关。对经验研究的轻视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可能是因为缺少数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不公开，自己去做调查又没有经费，多数学者因此只能坐而论道，写些不痛不痒的文章。《经济学季刊》收到的经验文章中，最多的是金融方面的，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金融数据是公开的。北大文科正在做的一件事，就是“中国家庭跟踪调查”，目的是收集家庭的跟踪数据，为北大和其他学校的社会科学研究服务。这个调查的数据将对所有人公开，经济学家也将从中受益。

在中国做经济学研究，最可能出成果的途径是通过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直接做抽象理论能否出成绩？当然可能，但概率很低。原因在于，中国毕竟不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中心，没有形成一定的理论研究的气场。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离开美国，其他国家的经济学理论研究都没有形成规模。但是，我们没有必要为此妄自菲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座金矿，研究中国可能产生新的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这当然不是说青年学者只需要关注中国，不需要关注国际上的理论进展或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反，我们研究中国，应该以其他国家为参照，同时借鉴他人的理论，这样我们才能把中国看得更清楚，也更容易走到世界学术的前列。

张 军：

对于经济学家，尤其是年轻的中国经济学者而言，研究结构和体制均不断转型中的中国经济问题是不容易的。这个难度被 **John Whalley** 教授的评论典型地指出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多数中国的经济学家不这样看问题。实际上，20 多年来，我们总是可以听到比我们年长的经济学家发表这样的看法。

可是，作为年轻的经济学者，并不容易体会这种看法的真实性与合理性。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年轻学者总是更多地从他们阅读的他人的论文中寻找研究的题目，其结果往往是，我们可以在理论模型中修改或者变化一些东西，或者在中国的经验素材上直接使用他人经验实证的方法和技巧。这样的做法之所以很普遍，主要是因为我们大多数研究论文的作者仅希望能用现有的理论解释在中国观察到的现象，并不追求“思想进步”，也不怎么进一步去关注自己的研究对政策选择的意义和实用的价值，至少后者实际上在大多数研究者的工作中变成了可有可无的部分。

因此，模仿现有的范式 and 技巧不一定伤害论文的质量而又可以满足现有经济学期刊的基本要求。在中国，我们常常看到，年轻经济学者的学术研究与公共政策研究者或者政策咨询者之间的联系是非常薄弱的，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没有什么关系。这反映出大多数年轻经济学者对问题的关注并非来自于对政府政策的关注，而可能来自于他人的论文和现有的文献。

我们自己，包括像 **John Whalley** 这样的海外的经济学家，总是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对经济理论的发展有贡献。这样的想法自然是假设中国的大国经济发展和制度转型过程对经济理论的发展有独特的经验价值。这个假设在当代经济学家内部当然是有争议的。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假设，而且我相信更多的经济学家会接受

这个假设，那么观察和研究中国经济的方式就值得我们不断去检讨，我们需要寻找更多的发现理论的机会。对经济学而言，中国的贡献肯定是来自我们能提出的（新的）思想和理论而不是来自对现有理论的直接应用。

我们也必须清醒的是，在中国的经济学术范式转型期间，**John Whalley** 教授指出的那种情况并不一定十分糟糕，也不会一成不变。状况是在改善。总的来说，在中国，我们总是可以发现，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年长的经济学家总是比年轻的经济学家能更好地体会中国，能较好地观察现实、对政策有更多的感悟，也相对更能关注大的和更重要的问题。这说明经验、阅历和观察中国的时间积累均可能在影响着对中国经济研究的态度和方式。如果有这样一个“函数”，它就是有解的。



何帆：

过去几年，我作为《世界经济》的编辑部主任，见证了中国经济学学科的迅猛发展、年轻一代经济学者脱颖而出。看看十年前国内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再看看今天《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等几家主流经济学期刊上的论文，真可谓恍如隔世。

学术期刊在引导经济学研究方向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世界经济》可能是国内经济学期刊中最早引入双向匿名审稿制度的。从实践的情况来看，主要的意义在于杜绝了过去靠资历和关系发稿的不正常现象。《世界经济》实行匿名审稿制度之后，明显的变化是名人的稿件减少了，大部分作者主要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青年学者，以及在校的博士，甚至硕士生。这一机制很像谢林(Thomas C. Schelling)所说的“绑住自己的手让自己得到更多的自由”。通过主动让渡审稿权，我们可以提高论文审稿程序的可信度，从而吸引到更多的优秀稿件。但是，必须看到的是，指望学术期刊在现有的水平之上进一步提高经济学研究的质量，恐怕是不现实的。经济学研究的水平是由研究生阶段训练出来的底子和做研究之后个人的悟性共同决定的。经济学期刊只能尽可能地接近当代学者的最优水平。而且，所有的匿名审稿制度，在本质上都是风险回避的，因此往往最富有创意的研究未必能够通过常规的审稿程序，换言之，审稿专家看中的其实不是最好的研究，而是和他们的研究最接近的研究。这就会导致匿名审稿制度在枪毙糟糕的论文时会毫不手软，但在挖掘新颖、大胆的创新之作时往往不知所措。更糟糕的是，在当前教育部门拔苗助长式的评选机制诱导下，发表论文已经成了越来越功利的一件事情，这是一种最有效的扼杀天才和创新的办法。

今后，学术期刊可能会在中国经济学研究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即确立学界普遍遵守的规范和一个密切联系的学术共同体。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期刊采用了较为规范的引证体例，使得大部分论文至少从形式上像是论文了。尽管这只是形式的变化，但其影响是深远的。今后，可能有更多的学术规范值得学术期刊来倡导。比如，关于抄袭如何来认定？引用别人一段话而未加说明，和整篇文章一字不改的照抄，在处理的时候如何区别？在怀疑作者有数据作弊嫌疑的时候，是否可以要求作者公开其数据？一稿多投如何处理？等等。库恩在谈到科学的发展时候，强调“科学共同体”的重要性。科学共同体是一些有共同范式的科学家组成的集团。他们受过共同的训练、有相似的观点、关注共同的问题、并不断的相互交流。过去，中国的经济学者之间交往太多而交流太少，中国的经济学者感兴趣的都是国外经济学家的研究，他们一般都看不上国内同行的研究，很少引用国内同行的成果，这使得很多青年学者处于一种“失重”状态，他们向往欧美经济学家的研究前沿，但是又无缘和顶级经济学家对话，在国内没有可以讨论的同行，也找不到有意义、有趣味的题目。学术期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失。至少在作者和审稿人之间，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同行间的讨论、批评和辩解。但也可以看得出来，很多青年学者并不熟悉这一“游戏规则”。平等讨论的风气、接受别人批评的气度、发现别人缺陷的敏锐、欣赏别人成绩的赤诚，都是需要从头学习的。“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任何优秀的研究，都是要在同行批评的“打磨”中变得温润如玉、光彩夺目的。我们几家比较志同道合的期刊经常召开讨论会，最近我和一些青年朋友又一起发起了“青年经济学者研讨会”(Young Economists Seminar, 简称YES)，都是想在这一方面多做些努力和尝试。

### 三、中国经济学者观点荟萃

#### (一) 什么是科学和有效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洪永淼：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系和统计学系教授，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WISE）院长、厦门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盛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葛赢：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教授

龚六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教授

洪永淼：

从方法论上来看，现代经济学研究可以归纳成以下这样一个路线图：

- (1) 观察经济现象、收集数据并从中总结出典型化的经验特征事实(Empirical Stylized Facts)；
- (2) 建立经济理论模型以解释经验特征事实；
- (3) 将经济理论模型转化为可用数据检验的计量经济模型并进行模型估计与检验；
- (4) 用通过检验的模型解释经济特征事实，验证经济理论和经济假说，预测未来经济变动趋势以及提供政策建议。

可以看到，对经济理论进行数学建模和对经济现象进行计量实证分析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分析方法，并统称为数量分析(Quantitative Analysis)方法。

数量分析的广泛运用是经济学家努力使经济学成为像自然科学(如物理学)那样一门科学的必然结果。并非所有经济理论都要

使用数学模型，但是，数学作为一种严谨的逻辑语言，相对其他表述工具(如文字描述)更能够确保经济理论逻辑的正确性与严谨性，特别是在分析较为复杂的经济问题时，数学更是能够显示其威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 John Whalley 教授做出很大贡献的 CGE 模型。事实上，经济学研究的最主要目的，是从大量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找出最为本质的规律性的内在联系。这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过程，而数学作为一种抽象的逻辑工具，非常适合这一思维过程。换言之，数学的使用非常有助于经济理论思维。当然，在使用数学工具时，必须注意数学模型重要参数的经济含义，以及数学公式所包含的经济思想，不要将两者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同时，并非数学越复杂越好。在能够解释所研究的经济问题的前提下，数学模型越简单越好。计量经济学中就有这样一个模型选择准则，叫“KISS”准则，即“Keep It Sophistically Simple”。这一准则也适合于经济理论建模。

经济学数量分析的另一基本方法是计量实证研究，即使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与工具，通过经济数据来检验经济理论模型是否与观测到的数据相吻合。同样地，并非所有实证研究均必须使用计量分析，比如案例分析也可以使用。但是当经济现象比较复杂，而可获得的数据又很有限时，计量分析可以保证实证分析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三十年前，中国经济学研究主要是定性分析，在研究方法上与现代经济学有着极大的差距。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数量分析方法已占据主流地位。但是，中国经济学的进步，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这主要体现在 John Whalley 教授所说的，很多中国年轻学者常常照搬西方经济理论模型来研究中国现实，没有将中西制度差别考虑进来。这种现象可能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一

个必经阶段。因为至今为止还没有比较完整的可用来解释中国经济现实的经济理论体系，年轻人首先看到和想到的当然是他们所学的从西方市场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教师在讲授现代经济学时，可能没有强调现代经济理论成立的条件与前提，特别是没有强调现代经济理论的前提假设与中国经济现实的可能差异。还有，批评照搬现代经济理论的学者在强调中国经济的特殊性的同时，没有提出建设性意见，即如何去修正现代经济理论模型以适合研究中国经济现实。甚至不少人强调中国特殊性的主要出发点是为了说明现代经济理论不适合于研究中国经济。事实上，从方法论看，经济学理论思维没有中国外国之分，如果中国和美国经验特征事实不同，相应的理论或模型当然也会不一样，否则将很难通过数据的实证检验。因此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确实需要考虑中国制度因素等特点。相对应的，在借鉴现代经济学的具体理论与模型时，一定要考虑这个理论或模型产生的历史背景、成立的前提与条件，以及其解释数据的能力。如果假设前提与中国经济现实相去甚远，这个理论或模型当然不可能解释中国经济现象。其实，即使是同一个经济理论，也可能解释不了美国经济不同时期发生的现象。如凯恩斯“需求不足”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典型的菲利普曲线，但对于八十年代的“滞胀”现象以及九十年代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的“低通货快增长”现象则无能为力。

因此，在我看来，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特别是数量分析，完全适合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强调数量分析与强调中国制度因素或中国经济特殊性并不矛盾，两者是有内在统一性的。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够更好刻画中国经济的本质。这是一种具有挑战性的经济理论创新，需要建立在对现代经济学的全面理解和对中国经济制度与现实的深刻洞察的基础之上。这种理论创新对现代经济学将是一个极大的贡献。

中国经济学研究仍然处于初步阶段的另一个标志体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王诚教授近几年来一直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经济学者对总结中国经济典型化经验特征事实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出发点是为了能够解释在观察经济现象基础上归纳总结出的重要典型化的经验特征事实，如宏观经济学的“菲利普斯曲线”、微观经济学的“恩格尔曲线”等等。在中国，很少有基于中国经济现象和中国数据而提炼出的典型化经验特征事实。这首先是中国经济学界对此重要性认识不足。经验特征事实是经济学家“对话”的基础。总结中国经济经验特征事实是一项艰苦的基础性研究工作，需要研究者对中国经济制度、历史与现实有深刻的认识，这项工作本身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其次，这也可能与中国经济数据的可获得性有关。因此，构建高质量的中国经济数据库特别是各种微观数据库，对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于绝大多数观察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数据具有不可重复性（或不可实验性）的特点，使用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结论的科学性取决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而很多新的发现常常是因为使用了新的研究方法。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取决于适合研究中国经济的研究方法的现代化。促进中国经济学研究方法现代化的一条有效的途径是国际化。所谓国际化有多方面多层次含义，它包括开展各种国际学术交流、合作与竞争，例如参加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与学术讲座、开展合作研究等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国际主流经济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国际化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学研究与目前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取彼之长补己之短，并激发竞争意识，充分发掘自身潜力，从而在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争取一定的“话语权”。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年轻经济学者应该积极争取在国

际主流经济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要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就必须采用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论文写作范式、研究方法和表述语言，服从国际上普遍公认的比较客观的学术评价标准。这些，十分有助于中国年轻经济学者培养严谨、细致、认真的科学研究素养与能力，有助于他们在现代经济学研究舞台上获得学术影响力与“话语权”，为现代经济学发展做出中国经济学界的应有的贡献。中国青年学者在国外经济学期刊发表论文的选题不必仅仅局限于中国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当然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学者首先需要研究的最重要问题。但是，中国经济正日益融合于全球经济发展中，研究全球性经济问题或世界上其他经济学家共同关心的经济问题对中国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

盛 斌：

John Whalley 教授在谈话中指出的问题是近年来国内高校在培养博士研究生，以及学术界在探讨经济学的未来走向时经常触及的一个问题——什么才是真正科学和有效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和教育在改革开放 30 年后经历了从“文字经济学”向“模型经济学”的转变，基本上实现了与国际（特别是北美）经济学界的接轨。论文的数理化与数量化程度从形式上决定了它能否被优秀的国内外刊物所利用，这似乎已成为界内通晓的“潜规则”。建模技术的发展、计量工具的高级化以及各类数据的可获得性极大地推进和强化了这一普遍趋势。经济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程度走在了前列，并向主流经济学所倡导的那种“仿效物理学的严密程度去探究复杂经济社会问题”的目标稳步前进。

我相信这种“世俗化”的研究方式使许多经济学家（还有那些热衷研究的准经济学家）内心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正统的研究方法使得经济学摆脱许多变幻莫测的“不确定性”，经济现象中的因果关系、作用机制和内部结构以模型化的方式被定性和定量地揭示出来，这种优势在多元分析时表现尤为显著；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充斥着理性色彩的经济学作品中少了许多令人忘怀的思想与智慧、少了许多富有冲击力和感染力的启示，少了许多过目难忘的激昂文字，“沉闷”的经济学似乎变得更加“沉闷”。“程式化”成为经济学论文和教科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经济学被讥讽为演变成了“社会数学”。的确，现代版的经济学就像一部深奥而华丽的电影，但缺乏美感，并很容易让人忘却。

这种矛盾在我国的经济学研究与教学中表现得尤为显著。第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研究的目标和方法的混淆。许多论文是为了模型而构建模型，但忘记了研究的目标是问题导向的。这种行为的结果往往导致一些表面上看来异常复杂、高深和玄虚的数理模型，但却“有壳无脑”，不能说明任何新的思想，研究最终落入了“智力游戏”的陷阱。第二个突出的问题是理论与实际的脱节。研究生所接受的经济学教育过于专注形式主义的技术，而缺乏对真实世界问题的关注与联系性研究。这种情况使得我们的学生有时会“荒诞”地模仿乃至照搬国外的模型，前提假定、个体特征和属性以及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差别被统统抛在脑后，进而使逻辑演绎的理论研究与经验性研究严重脱节。第三个突出的问题是众多和潜在的调查研究、政策分析性研究、战略性研究以及“科斯式”研究被主流的“程式化”研究所掩盖甚至遏制，其成果也在智力上遭到贬低。由于缺乏数学符号和公式的光环修饰，许多优秀的朴素研究成果在主流杂志上找不到立足之地。它们的缺失的受害者恰恰是正统经济学，因为后者完全可以从前者的所谓“描述性”研究中嗅到许多诱人的研究线索。

John Whalley 教授谈到的问题必须引起我国经济学理论界和教育界足够的重视。现有的高度抽象与现实脱节的程式化研究与早先的信息加工和主观臆断式的研究同样都不可取。不过我们也不要为当前出现的“危机”过分忧虑，总的来说，正统或主流经济学并没有偏离发展的历史轨道，它的风格与方式符合科学发展的潮流，模型、数据、统计、计量等都是职业经济学家所必须具备的技能与经历的过程，所需要做的只是某种程度上的矫正与折衷。其中一个关键的改进是经济学家需要更加关注真实世界——找到好的选题，包括政策性问题和对策性问题。他们需要不仅能够回答挑战其智力水平的“为什么”的问题，更要有义务回答“怎么样解决”的“显学”性问题。研究不应该成为自我欣赏和自我满足的技术工具，而应为提高社会福祉、构建有效率制度体系以及预防危机的发生做出贡献。每当经济冲击和危机来临时，我认为有良知的经济学家都应或多或少感到负罪感和耻辱感，那时他们可能才会意识到他们所掌握的经济学原理是多么的贫乏和所关注的研究离社会需求是多么的遥远。学术界应该共同努力认知和修正这种过于“经院式”的研究范式。对于处在独特历史阶段的当代中国经济学家来说，研究的这种道义责任感则更加重大。

另外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模型。经济模型的确高深，需要智力与技巧，但它并不神奇，它只不过是直观而简洁地反映了经济现象的内在机理。我认为好的模型不一定很大，应该抓住本质构建“精巧”的模型。但无论怎样，模型起源的问题一定来自现实的观察，同时需要一点直觉，它会构成某种猜想，当通过模型得到验证时，就成为了模型的精华或实质——构建者的思想。在这方面，我十分推崇 200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Paul Krugman 教授所倡导的 MIT 方式，即：利用量身定做的精巧模型说明某种经济规律，并能够进行政策分析。这对我国的经济学研究

生的教育与培养是很好的启示。

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外部世界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讽刺，也容忍了内部世界中某些激进的经济学家（像马克·布劳格）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抨击。但我们绝不能够就此麻木。经济学应更努力关注和贴近现实，创建简约、有的放矢和富有思想活力的模型，从而真正洞察和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最终为化解难题和迈向更有效率的人类社会做出智力贡献。但愿不再要像一首英国流行歌曲所唱到的“请不要和我谈现实，因为我是一个经济学家”。

葛 赢：

John Whalley 教授的谈话指出在研究中国经济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要问题，我根据个人的研究经验有以下一些体会：

第一，在中国研究经济学的学者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即学术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平衡，对经济学普遍规律的研究与对中国经济特殊性的研究的平衡。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学界比较注重应用研究，即研究成果要解决实际问题，强调研究的政策借鉴意义，研究注重对中国国情的理解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的把握。另一方面，国际主流的经济学研究可能更注重对经济学普遍规律的研究，强调研究成果的普遍意义，如果研究成果具有太强的中国的特殊性则难以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上发表。这个平衡问题成熟学者掌握较好，而青年学者因为自身还没有形成稳定的研究风格与重心，同时发表的压力很大，容易陷入困境，如 Whalley 教授谈到的为求发表将国际主流模型生搬硬套地运用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就是一个容易犯的错误。这个问题的解决没有捷径，只能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不断摸索与调整以掌握良好的平衡。深入了解国情并提出

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建立在长期研究积累的基础上，青年学者不应该过早转向应用研究，追逐当前的热点问题，而需要用主要的精力去了解、跟踪国际与国内的主流文献，掌握规范的研究方法与规范的表达方式，争取在国内外一流学术期刊上的发表，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础。

第二个容易遇到的问题是理论研究 with 实证研究的联系与平衡。有一些研究仅限于对已有的理论模型作一些修改，使数学模型更复杂，既不考虑修改模型的目的，模型所要解释的实际的现象是什么，也没有任何实证证据支持模型的结论。另一些研究仅限于用中国的数据套用文献中的实证模型与方法，缺少理论背景，缺少对经济机制的解释与对中国特殊性的理解。这些研究可能过分注重建模技术与计量技术，理论与实证的脱节非常明显。因此，偏重于理论研究的学者应该增强对现实世界的经济现象的了解，考虑如何验证模型的结论，增强模型与实证发现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偏重于实证研究的学者应该增强对经济理论的把握，在一个有趣的实证发现后面必须有一个很好的经济学故事来解释与支撑。

第三个问题是宏观与微观层面研究的平衡。中国的经济学界可能比较注重宏观层面的研究，分析与预测宏观经济的发展，为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借鉴。但微观单位如企业与住户是社会生产、贸易与消费的载体，政府的政策是通过影响企业与住户的决策行为来影响整个经济。微观载体的异质性已经成为国际主流经济理论发展的一个重点，实证研究也进一步向微观层面拓展。因此，随着中国微观层面数据的增加与质量提高，对中国经济的微观层面的研究应该进一步加强。

龚六堂：

虽然我与 John Whalley 教授未曾谋面，但是他的相关论文我看过，特别是近年来对于 CGE 模型的关注，Whalley 教授应该是对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界比较熟悉的一位学者了。他提出的一些关于中国经济学研究以及中国经济学者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值得大家思考，事实上，这个问题很多国内学者在多年前就已经有过思考，如在 2001 年 6 月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和《经济研究》编辑部组织的第一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上就有关于中国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讨论，王江教授、林毅夫教授、陈志武教授、周春生教授等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现在由 Whalley 教授再次提出，就显得这个问题更重要了。

首先，我认为 John Whalley 教授提到的问题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确存在，这主要的原因我认为下面是几个方面：第一、目前学术界的急功近利、浮躁风气存在。有的人直接把国外论文上的数据用中国数据代替进行分析就去发表，就去投稿，不去思考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国外的方法是否适用？当然，我们不是不提倡在经济学研究的初期需要模仿别人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但是，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第二、各种评比和排名、以及职称的评审导致了青年学者不深入思考。现在各种评比包括重点学科、一级学科等学科的评比，职称的评定以及博士生的毕业论文要求使得这些学者在训练的时候就没有深入思考，也来不及深入思考。有的博士生本来很好的工作因为毕业论文发表的压力不得不把本可以更深入的研究投出去了。说的更白一点，就是为发表而发表。

其次，通过多年的努力，应该讲国内的经济学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主要体现在下面的几个方面：第一，大量的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回国以及国外学者到中国的讲学已经把规范的

经济学研究方法带到了国内。现在已经有大量的国内学者可以在国际刊物发表文章，而且在国外顶级的经济学刊物也出现了国内学者的名字。这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至少国内的学者已经能够和国际学者站在一个平台上了；第二，国内的经济学刊物规范性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如《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等传统的优秀经济学刊物，以及新办的经济学刊物《经济学季刊》、《经济学报》等已经成为经济学规范研究发表的重要阵营。

第三，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关于中国问题的探讨文献还停留在模仿阶段，没有自己真正的关于中国经济的理论模型。如关于中国二元经济的框架如何建立，只有建立了这个框架才能来重新考虑大量的现实问题，理解现实经济。第二，中国经济问题没有真正抽象出来成为所有的经济学者关注的问题，可能中国经济问题很重要，但是真正把对于中国经济本质体现的问题形成，因此，虽然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远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受到了经济学家的关注，但是，真正把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作为自己研究方向的国外学者还是相对较少。我想根本原因是没有形成研究中国问题的基本框架。

## (二) 本土化：中国现实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周黎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副教授

姚枝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室主任，副研究员

陈 钊：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世界经济文汇》编辑

代 谦：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周黎安：

我看了 John Whalley 教授的谈话后很有感触。Whalley 教授所担忧的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些问题确实存在，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和反思。我也特别感谢能有这样一个讨论，让我们在研究之余也驻足思考一下我们自己的研究应该朝哪儿走，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经济学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和工具，有其强大的分析能力，适用于非常广泛的现象和问题。对于像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这样的分析工具，其有效性不依赖于任何所谓的“国情”的限制。对于有些学者反复强调经济学的“国情”特点、以此质疑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我是持反对态度的。如果我们看到糟糕的经济学分析，问题不在于经济学本身，而在于分析者本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也不认为有所谓“中国经济学”的存在空间。

但经济学所谓的主流研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确实有不同的“热点问题”和众人追捧的“时尚”，在引领学术潮流方面，美国及欧洲的经济学家显然占据绝对的“话语权”。而欧美经济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宏观问题）与他们所处的经济环境会存在内在

联系。这就像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医学的发展，必然受到西方人的疾病演变的影响一样。我们中国学者在学习和研究现代经济学时离不开阅读经济学著作和期刊论文，甚至向欧美的经济学期刊杂志投稿，研究兴趣自然会被欧美学者所关心的“热点问题”和“流行时尚”所吸引和影响。你把一篇有关中国方面的经济学论文投给欧美的经济学杂志，你经常被编辑和匿名评审人问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凭什么要关心你们中国的这个问题？你有什么东西让一般的读者（即欧美的读者）感兴趣？这本身其实也无可非议，可以看作是经济学研究“全球化”的一部分，知识要进口，也要出口，出口就要考虑顾客的偏好，我们中国学者必须学会适应和利用这个全球化的浪潮。John Whalley 教授指出的问题不是出在我们学习和研究欧美学者所主导的经济学，而是出在我们追逐“主流”的时候，常常忽略了最基本的一个事实：经济学是帮助我们理解和解释现实世界的问题和现象，其价值在于对于问题和现象的解释力。这里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我们中国学者要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和变迁过程中的问题，不能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主流问题”就遭到贬低和轻视。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通病是过于追逐“经济学主流”，对中国特有的现象和问题研究不足，“身在曹营心在汉”，就像一直关注西方医学前沿进展的中国医生漠视中国患者常见的“地方病”一样。第二，在借鉴、应用和拓展现代经济学的一些模型的时候，忽略原始模型所隐含的假设条件，不加转换、生搬硬套到中国的问题情景，这种强行移植式的研究自然不会有什么解释力。最可怕的情况就是看到国外的某篇文章，然后就简单拓展一下，或是找来中国的数据再做一遍，以为这就是做研究的捷径。当然在早期的学习阶段，这种简单模仿也许是一个必经阶段，但从长期看，作为中国学者，真正有价值的研究一定是利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深刻揭示和解释根植于中国环境下的独特问题与现象的研究，这

些研究不仅有助于解释中国独有的问题，还对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我能够想象到的最好的例子，就是科尔奈的贡献。科尔奈基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行为提出了关于“软预算约束”的概念，后来经过 Maskin 等人的发展，“软预算约束”的概念超出了计划经济的范畴，成为经济学一个重要的基本模型，被应用到许多不同的场合。我希望根植于中国的学者某一天也会做出类似于“软预算约束”理论这样的学术贡献。

姚枝仲：

John Whalley 教授谈的问题其实在国内学术期刊上也存在。不过，在我看来，这不是因为钻研模型钻得太多了，而是因为钻研得不够，还没有学好。经济学中的数学模型，自马歇尔和萨缪尔森以来，已经日趋精细和系统。在这些精细的模型背后，是传承了两百多年的经济学思想和理论。理论发展的每一步，无一不来自于经济学家对经济现实的深刻理解。因此，模型都是来自现实的。同时，模型都是对现实的抽象，是一部分现实，而不是全部现实。为了理解不同的现实，需要不同的模型。效用函数的轻微变化，可能是为了说明完全不同的消费行为和需求曲线，生产函数的轻微变化也可能是为了说明完全不同的生产特征和市场结构。理解模型，不仅需要理解其数学结构，更需要深入地理解模型所针对的经济现实，需要在理论、数学与现实之间建立对应关系。“照搬模型”就是不了解模型所针对的经济事实，就是还没有建立起理论、数学与现实之间的对应关系。要解决照搬模型的问题，除了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经济外，还需要更深入地理解模型。



在理解模型与现实的关系方面，我们的老师那一辈的经济学家是做得比较好的。他们经历了研究范式的转变，把理解和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当作自己的责任，而把理论与模型当作理解和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工具。他们对中国经济的过去与现状、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争论有切身的体会，对理论与模型在理解中国经济问题方面的优势与局限性也有切身体会。他们擅长使用基本的经济学逻辑和适用的模型来理解中国经济。他们的研究经历与研究态度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在年轻一代的经济学者中，确实存在鼓捣模型发表论文的现象。同时也有一大批的学者在努力理解中国经济。至少在我的同事和我所熟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青年学者中，就存在很多这样的人。在他们之中，不乏能够驾驭模型来理解中国经济问题的优秀研究人员。不过，客观地说，要实现在理论、数学与现实之间的自由转换，要成为真正的中国经济学家，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们不仅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经济，还需要了解理论前沿的进步，需要熟悉经济学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了什么问题，正在解决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了解中国的哪些经济事实是可以利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的，哪些是难以解释的。只有完成了这些工作，才能在经济学理论、数学模型与中国经济事实之间建立起牢固和科学的联系，才可能依据中国经济事实推动经济学理论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经济学者，尤其是青年经济学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陈钊：

经济学研究，无论是理论的还是实证的，都是为了给重要的问题提供科学的答案。如果基于中国的研究能够让我们找到新的重要问题，或者是为原有的问题提供更为科学的答案，那么，这就构成了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

John Whalley 教授所提及的那些机械效仿国外研究的青年学者们，也往往将中国问题研究与前沿问题研究完全割裂开来，这些想法都有失偏颇。我们不妨思考一下，重要的问题从何而来？除了类似于证明一般均衡存在性那样的纯理论研究之外，现代经济学发展至今，越来越多的重要问题都更直接地来自于现实世界。即便是理论研究，如张五常的分成租佃理论，创新的思想也是来自对现实世界的细致观察。的确，西方的经济学者已经建立或发展出许多让我们深刻认识现实的理论模型，得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结论。但正如科斯所言，“一般化(**generalizations**)可能并不是有益的，除非得出这种一般化的研究考察了在不同的制度框架内这些活动到底是如何产生的”。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发现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制度框架，那么通过对中国问题的考察，我们至少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检验现有理论的适用性。或者，更为幸运地，我们还可能发现已有理论的不足，并因而完善或发展该理论。例如，John Whalley 教授所说的儒家文化强调群体价值，这就需要在个人决策时将集体的特征或选择纳入到个人的决策考虑之内。事实上，社会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正是考虑了这种群体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而站到了理论的前沿。同样由于制度框架的不同，基于中国的研究还能提出新的重要问题。例如，中国的户籍制度分割对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城市发展中的经济、社会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究竟怎样？为这些问题提供科学的答案，恰恰也是我们基于中国实践对发展经济学

可能做出的贡献。

然后，我们再思考一下，如何使经济学给出的答案是科学的。对于理论研究，只要问题来自于现实，那么对问题的回答就必须考虑特定现实中重要的特征事实。一些在国外研究中可以被抽象掉的次要因素，在中国问题研究中，却可能是影响结论的关键因素。John Whalley 教授提到的在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供给行为时，需要对个人效用函数重新加以界定，恰恰体现了这一点。显然，如果我们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只是机械套用国外现成的理论模型，那么我们就无法发现这种带有国别差异的重要事实，因此建立的理论模型往往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失败的。

实证研究又如何呢？有些青年学者在实证研究中往往倾向于运用更为复杂的技术，而忽略了复杂技术运用时需要考虑的一些前提条件。这种做法其实反映出对于计量经济学分析技术的误解。可以说，所有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技术的进展，都只是为了让我们得到更为科学的结论。也就是说，如果通过传统的计量分析方法就可以得到科学结论的话，我们就完全没有必要为了复杂而选择看似高深的技术。

John Whalley 教授发起的这场讨论开了一个好头。希望更多的青年学者能够在不断掌握新的分析技术的同时，只是把技术当成一种工具，并且也能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深刻地理解了现实，我们所用的技术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最后，我想说的是，强调中国本土问题或现实问题对于我们开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是在现代经济学语境这个在我看来已经是默认的前提之下的，事实上，我们讨论的内容恰恰是如何基于中国的问题对现代经济学做出贡献。

代 谦：

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本身也在迅速转型，由以前盛行的苏联范式向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转变。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已经与十年或二十年前大不一样，对比今天《经济研究》上所发表的文章和《经济研究》十年前所发表的文章，你会感受到这种巨大的差异。而十年二十年前却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刚刚接触经济学的年代。目前中国经济学就像台湾经济学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估计还有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国经济学的转型就基本上完成了。换句话说，等到我们现在所教的学生“出道”的时候，中国经济学的转型过程就基本上完成了。显然，国外的经济学家也注意到了中国经济学研究所发生的变化。实际上，在 2008 年复旦大学召开的第二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研讨会（YES）上，大部分与会青年学者都认为中国经济学界利用现代经济学的规范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理准备已趋于完成。

在中国经济学的转型阶段，我们看到了国内大量的学术论文表现出练习的性质：要么将国外一个主流模型人为的修改某个参数，稍稍解释一番，然后将原始模型所得出的结论在修改的模型中重新推导一遍，而不去考虑修改的模型是否适用于自己所研究的问题，文章充斥数学方程，但是文章抽去数学模型之后，什么都没有；要么机械套用国外现成的计量模型，利用中国的数据再估计一遍，来一篇“来自中国的证据”的文章，而对原始方法的适用范围、条件不做考虑，也不考虑自己的数据是否满足估计方法的要求。现实中的学者面临很多现实的压力，现实的压力使得更多的学者单纯追求文章的发表而并不考虑学术本身的严肃性<sup>1</sup>。以学术研究的眼光来看，

<sup>1</sup>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经济学研究的转型不仅意味着研究方法的转型，更意味着研究规范、学术制度本身的转型。这个问题更加复杂，需要专门讨论，在

这样的学术文章离真正的学术研究还很远，但是这却是中国经济学转型的必由之路。先是模仿师傅做练习，然后才有可能原创。

现在的问题是，当我们将现代经济学技术层面上的技巧差不多学习完毕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利用主流经济学的规范和方法体系进行自己的经济学研究？经济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科，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是经济学的特点。中国的经济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自己用的理论模型多么复杂，利用的估计方法多么先进，自己追踪的文献多么新，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美国学者多么关注等等；而在于自己是否在中国经济现实中发现了已有的文献无法解释的新问题，自己是否对已有的旧问题提出了新的解释，新的观点和新的解释逻辑上是否合理，是否符合现实等等。当我们在现代经济学基础知识方面的准备基本完成的时候，我们应该认真思考我们进行经济学学术研究的意义何在。数理工具仅仅是学者们表达自己思想的工具而已，它有非常多的优点，所以现代经济学普遍采用；但是如果认为现代经济学就是数学，那么就真是本末倒置了。没有经济思想和经济逻辑的数学模型，仅仅只是没有灵魂的躯壳。斯密的国富论完全不用数学，但是他关于市场机制的思想却是整个现代经济学的核心；李嘉图也不用数学，但是比较优势理论却长盛不衰。看看AER、JPE、QJE上的文章，经济学大师们对于复杂问题的分析举重若轻，把繁复的数学证明放在附录中，正文中的模型非常小巧，文章所要讲的故事放在文章中，引人入胜，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动手推导文章中的命题，却发现需要非常深厚的数理功力；反观我们国内学者的文章，经常把数学证明放在正文中，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用了数学工具，恨不得向全国人民报喜，文章本身的思想 and 逻辑却单薄无力。我始终认为年轻一代有工具和研究方法，但是经济思想、

---

此并不展开。

逻辑训练以及对中国经济现实的把握方面远不及上一代人，我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向前辈学习！

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关注应该是未来中国经济学科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中国学者在研究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问题方面并没有什么优势。例如中国的学者如果对中国的农民工歧视问题视而不见，挖空心思研究美国的黑人白人歧视问题，那是非常可笑的事。在这里，我没有资格去对中国经济学的未来指手画脚，但是就我自己的研究来说，我自己仍然会坚持中国问题导向。

我们都是转型的一代人，转型的一代人有转型一代人的使命，如何将转型过程变得更快一些，如何为后面的学生和年轻人奠定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是我们这些人所需要考虑的。我们的任务是如何将学界这种重技巧和方法的研究路数、如何将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套用国外方法和模型的研究思路转向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我想我们的任务并不轻松。

### （三）规范化：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李宏彬：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授

贾俊雪：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

潘士远：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沈 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李宏彬：

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体系和评判标准。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都希望研究中国经济能象研究中国社会学问题一样成为北美经济系的一个重要专业，但仔细想一想，这做不到。经济学讲究共性，希望得出的结论能广泛运用，所以不太可能把一国经济当作一个学科分支。有趣的是，Whalley 教授提到的把家庭放到经济分析体系里的工作其实一直都有经济学家（西方人、印度人、欧洲人或中国人）在做。Bardhan 和 Udry 的发展经济学教材一上来就讲家庭-农场模型。最近几年对家庭经济学贡献很大的哥伦比亚大学的 Chiappori 教授对家庭有很多开创性研究。关于家族企业，最近也有很多研究。当然，也许 Whalley 教授是对的，中国的家庭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可能有一些有趣的东西没被发掘，这些东西对于我们理解一般性经济学问题有帮助，中国人在这方面有可能作出贡献。

经济学绝不是美国经济学、或所谓西方经济学，只是美国人或西方的经济学家比较多，他们只了解自己的经济，当然要研究自己的问题。毫无疑问，中国有很多有趣的经济学现象值得去研究，只是需要既了解中国又能用经济学语言把事情很有逻辑的描绘出来的学者。所以，应该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接受系统的经济学训练。当

然了，经济学只是一种工具、或语言，掌握了语言要活学活用，绝不能鹦鹉学舌。其实，熟悉北美学术规则的人都知道简单的套用是不会把文章发在高水平的期刊上的。

每件事的发展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和机制。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发展也不例外。现在要做的是让更多的人接受最基本的经济学训练，而不是创出所谓“中国经济学”来。我想，随着时间的发展，Whalley 教授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的逻辑去思考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套用。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现状和未来我很乐观。

贾俊雪：

应当说，John Whalley 教授所谈及的问题事实上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这也是由经济学的固有特点所决定的。与自然科学不同，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一方面存在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规律，但也存在着与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以及政治制度紧密联系的独特现象。也正因为如此，才有所谓的“美国经济问题”、“欧洲经济问题”和“中国经济问题”。所不同的是，由于中国经济学研究正处在一个痛苦的转型过程中，因而 John Whalley 教授谈及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也更为重要！

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与国际接轨也即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学研究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过程中，国内学者希望能够熟练掌握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熟练运用国际通用的“语言”来讲述中国经济“故事”。但无论是对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把握上，还是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上，青年学者都存在着明显不足。不过，就我看来，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欠缺才是目前真正制约我们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瓶颈”。对于中国经济现实把握的不

足，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寻求合作来很好地加以解决。国内的老一辈经济学家们对于中国经济有着深刻、独到的认识和理解。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获取丰富的营养。但如何借助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将这些对中国经济的深刻认识与理解严谨和规范地表述出来并进一步加以升华，确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例如，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尊老爱幼”的行为规范，这种不同代际主体间的行为互动模式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深刻影响。但要想准确地刻画这种传统文化信念驱动下的个人（家庭）行为特征及其对人力资本积累、家庭储蓄以及养老保障的影响机制，就需要我们能够系统把握代际交叠模型（OLG）的理论内涵和研究范式，进而在理论模型与典型事实之间建立起内在统一的联系。事实上，正因为我们目前还无法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才会导致大量“生搬硬套”现象的出现。因此，我非常赞同姚枝仲的观点，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并不在于数量化和模型化过多，而在于能够真正将现代经济学理论模型以及实证方法融会贯通并在经济现实之间自由转换的太少！

这意味着，在今后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我们都应当进一步强化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学习，并更多地去运用这些研究方法。只有通过这样的不断学习和训练，才有可能使我们真正地认识到现有理论模型和实证方法的适用性和局限性，才能够在未来的研究中将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现实更加完美地结合起来，进而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加以创新，推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

潘士远：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和规范化水平是最高的。也可能正是如此，如何提高中国经济学的整体研究水平，从而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就成为大家关心的问题。我认同 John Whalley 教授的观点。与其他学者相比，土生土长的中国学者对中国现实的了解有天然的优势。如果我们不利用这一优势，为中国经济学，乃至一般经济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那么显然我们本身就没有学好比较优势理论。这样，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道路也可能不会是最有效的。

但是，要在中国问题和一般经济理论研究上取得突破，我们需要对现有理论进行深入了解。由此，在这一层面上，许多年轻学者强调建模技术本身可能并没有大错。因为只有深入了解已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才可能创建新的经济理论。同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建模技术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最终想要的是，中国独特现象和漂亮（实证和理论）模型的有机结合，以促进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化。可喜的是，一些中国学者已经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这里，我还想谈谈另一方面的问题，这也仅是一孔之见。没错，中国的一些现象，包括 John 举的几个例子，确实比较特殊，照搬西方的经济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肯定做不到尽善尽美。但是，当我们强调中国问题的独特性时，要尽量做到不要矫枉过正。如果大家在学术交流中，过分强调中国问题的独特性，这可能无益于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首先，在经济学修养上，我们与西方有着一定的差距。我们中的一些人，至少我本人，并不非常了解西方的经济发展史和经济学说史。因此，当强调中国问题独特性时，我们可能会犯错误。这有两种可能：一是，一些现象在其他国家已

经发生过，已有的经济理论也已经解释过，但我们不是十分清楚；二是，已有理论可以解释一些现象，可是我们没有琢磨透它，误以为它不能解释这些现象。其次，在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上，我们与北美和欧洲有着相当的差距。因此，即使暂时没有考虑中国问题的独特性，运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一些中国问题可能也有其价值。先模仿再自主创新可能是有效率的。这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学发展所要迈出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一些中国学者一定可以在考虑中国问题独特性的基础上发展出一些新的经济理论，从而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沈 凌：

如果我们去问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的物理学老师，他们教的是西方物理学抑或是中国物理学，一定会被他们笑掉大牙。如果我们去问三峡大坝的设计者，他是不是因为没有学习中国物理学，就会不管长江的水文地理参数，直接拿了田纳西水库的参数来建我们的三峡大坝，同样也会被他们笑掉下巴。但是，一个在物理学界早就解决了的问题，在中国经济学界，仍然在被广泛讨论，实在是让人怀疑中国是不是连五个经济学家都没有了。

到目前为止，在学科范围，能够被冠以“中国”两个字的，好像就是中国哲学，还有中国医学。其他还有没有，我才疏学浅，还不是很了解。但是，中国医学并不是说只研究中国人内脏的医学。把中国人解剖开来，切割搭桥的，用的还是西方医学。只不过是西医在中国人身上的运用。中医之所以是中国医学，不是因为它只研究中国人的特殊问题，而是它有一个完全不同于西医的医疗理念和方法。同样的，这样的医疗理念运用到西方人身上，还是有效果的，

这就是为什么中医针灸能够在欧洲美国广为传播的原因所在。

所以说，包括 **Whalley** 在内的大多数学者提到的结合中国实际问题，说的还是如何运用西方经济学（暂时无用这个大家习惯的称呼吧）去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罢了。也是中国工程师和医生们已经身体力行了一个多世纪的事情。实在是没有什么新鲜的可资议论。

在给定西方经济学就是一个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如何运用这样的分析方法去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对于中国经济学者来讲，至少有三个层次的事情可做：

切实学好西方经济学的方法理念。为什么我们现在有部分的学者，和部分的管理学者的相关机构，会陷入对于数学模型的迷恋和崇拜，以至于给人一种舍本逐末的印象？大概是因为我们正处在掌握数学模型还远远不够的阶段，就像小孩子模仿大人剔牙齿，其实他们并没有牙缝。我们只有知道了为什么需要数学模型，才算是真正掌握了数学模型。

在真正学好了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了之后，会很自然的想到中国现实中间的许多经济问题是国外的现有理论已经阐述清楚了。是可以运用“拿来主义”的。这个“拿来主义”不是照搬照抄，而是至少有“知道拿什么”的眼光，和“拿来如何用”的本事。这个“拿来主义”其实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不幸，变换了表述方法之后，好像再次成了讨论的热点。**Whalley** 所说的几个例子，国有企业，家庭观念，大体就是这个意思。

在了解了中国实际情况，同时熟练了西方分析方法之后，或许，我们可以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提炼出貌似“中国特色”的经济问题。通过解析，得到更加一般的规律。从而丰富西方经济学主流思潮的理论内涵。扩大主流经济学的解释范围。这就好比相对论对牛

顿经典力学的拓展。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思潮，离不开滋养它成长的现实经济。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在中国现实经济现象上面，（比如 Whalley 提到的家庭价值观念）提炼出不一样的模型构架，并且得到它的存在条件，甚至建立家庭价值观和个人价值观的临界条件，那么就是构建一个超越西方和东方的价值观的更为一般的理论模型。这样的工作，是不仅仅对于中国有着巨大的贡献，而且对世界也有着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我想，林毅夫所说的中国经济能够在未来孕育出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是指这个层面的成就吧。

如果就是停留在这上面的所说，其实，谈不上“中国经济学”，就像没有什么“中国物理学”一样。如果说真正的“中国经济学”，应该是和中国医学一样的方法论和分析理念上面的不同。说到这里，很多人误认为坚持不用数学模型就是在坚持中国经济学。这成了很多人不学习数学的好借口。但是他们不用数学的同时，还是在试图达到用数学欲图达到的一样的目的。即，理清逻辑关系，解剖客观事实。由于语言的不精确，常常事倍功半。大家吵来吵去，最后都不知道吵什么了。

其实，中医能够独立于西医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是因为它说不清楚，（这恰恰是它的缺点）而是因为它的系统论的整体思维方法完全不能用解剖的科学手段来分析。而目前来讲，我才疏学浅，还看不到什么中国人能够用非科学的其他分析手段来解释人类的经济行为。所以，虎头蛇尾，等待拍砖。

#### （四）国际化：中国青年学者的探索

杨其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副教授

杜宁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夏立军：上海财经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教授

徐现祥：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主任，副教授

杨其静：

在我看来，John Whalley 教授其实在提醒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的经济学家的职业责任是什么？进而激发我们不得不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即中国经济学界需要什么样的国际化？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最好从经济学研究的两个层面来寻找答案。

作为一门研究稀缺资源约束条件下当事人如何最优决策的科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适性。揭示这些普遍规律并在分析方法和技术工具进行创新，自然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经济学家的共同职责。从这个角度看，世界上并没有西方的经济学和中国的经济学之分；而所谓的差别更多地体现为我们在经济思想、理论框架、分析工具和技术手段等方面与西方同行的差距。因此，是否需要向西方经济学界学习并在经济学教育中加强经济学分析工具的训练，不应该再是中国经济学界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而且，当今的中国经济学家也承担了一个重要职责，即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以显示我们的研究水平得到了国外同行（老师）的认同并赢得更多的话语权。

如同中国体育健儿需要赢得奥运会奖牌，我们应该为那些在（尤其是顶级）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的中国经济学家鼓掌。不过，

这似乎还不是整个中国经济学界短期能够实现的目标，尤其是在那些涉及经济学理论框架、分析方法和技术工具等基础领域做出突破性的、引领性的创新更是不太可能，因为这需要长时期的学术沉淀与积累。更重要的是，这也不应该是中国经济学家首要的社会职责。

经济学不是智力游戏，其价值和魅力在于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剖析，并以此为基础为我们提供一些可供社会选择的、用于改进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行动方案。这注定了经济学研究从来都是问题导向型的，其原动力来自于经济学家们的“经世济民”的社会职责。

由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所面临的问题不同，因此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虽然经济学无国界，但是经济学家却是有国界的。各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家精力也是一种稀缺资源；对社会最优价值的配置方式就是将这些资源主要用于研究与本国相关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比如，移民和种族问题很受美国经济学家关注。但对中国来说，发展和转型问题才是当前的核心问题，因此利用现代工具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应该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

此外，与自然科学不同，各国的经济学所面临的研究对象是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由于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中，因此当事人的行为方式会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差异并不是可以剔除掉的干扰因素，而且也不可能通过实验室手段来剔除。这意味着，有效的经济学分析必须考虑到经济现象所存在的特殊历史社会环境；相应的，经济政策必须充分考虑到该社会的特殊性，否则未必有效，甚至反而有害。

从这个层面来看，中国经济学家的首要职责就是正确地剖析中国问题的本质，搞清楚其发生和改变的条件，而不是单纯地追求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只要我们把中国问题研究得足够深入和精

细，国际（顶级）刊物自然会刊出我们的论文。到那时，“中国的就是世界的”，我们也就不必为国际化不足而苦恼了。

不仅如此，对中国经济学界来说，这也是最可行的国际化道路。毫不夸张地讲，若不是对相关问题有深入了解和心灵体验，那么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将是无米之炊，无的放矢。事实上，两个层面的经济学研究往往是相互促进的。绝大多数被我们视为揭示了一般规律的纯理论都源于作者自己熟悉的欧美社会中的某个故事；而且，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经济学家对一个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过程中获得的。对我们而言，中国的发展和转型等现实问题的切身感受就是我们的最大优势，而且也最有可能在相关研究中对经济学发展做出一般性的贡献。



杜宁华：

“作为学者，做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这是研究人员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回答，研究人员会无可避免地陷入迷惘，在职业生涯的得失取舍之间会体验到无法自拔的痛苦。这并非夸张，每个从事科研工作的人都多少经历过这样的困扰。我个人认为，学术研究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探索真理，通过我们的工作，为更深刻地认识世界创造条件。

在研究人员的学术生涯中，有几件相互关联的任务：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取得研究课题的资助，而在高校工作的青年学者还要为获得终身教职而努力。这几件任务极有可能影响到一个人职业生涯的走向，非常重要，需要研究人员投入极大的努力。但我在这里想要说明的是，这些任务本身并不是学术研究的目的是，完成这些任务只是为了“探索真理”这一终极目标创造条件。在国内、国际的刊物上发表论文，是为了能让更多的同行了解自己的工作，从而得到更多的反馈和批评以帮助自己改进研究；争取科研资助，是为了拿到更多的资源来回答问题；争取终身教职，是为了得到必要的物质待遇保障以免除后顾之忧。上面说到的这些都是探寻真理的道路上值得争取的有利条件，但这些条件并不是探寻真理的必要前提，更不是我们的目标。如果由于各种原因论文未能发表，科研经费未获批准、甚至未能在一定期限内得到终身教职，这些都并不值得懊丧，因为这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在探寻真理的道路上，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其它有利条件。

可能的论文需要两三年的时间发表，还有的论文拖了六七年才与读者见面；回顾文献史，振奋人心的转折点只有几个，绝大部分工作只是在前人基础之上前进的一小步，更有相当一部分的工作只是在提示后人不要再在相同的道路上做无用功。但凡此种皆不必挂怀，还有什么能比自己所感兴趣的研究问题得到回答更令人兴奋的呢？

夏立军：

我想讨论的是为什么要发表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的问题。这个问题有的人觉得理所当然，根本不用问；而有的人觉得这还真是个问题，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为什么一定要发表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可能本土出身（指从本土而不是从海外取得博士学位）的学者中第二类人相对较多，所以这个讨论只是和这些学者做个交流。我本人对于发表国际高质量期刊很不在行，刚刚入了一点门，基本上是一个初学者。不过，我觉得在可见的未来，本土出身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发表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都很有必要。主要的理由有这样几个：

首先，除了看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发表情况以外，可以用其他方式考核和评价国内学者的学术水平呢？看学术专著？出书通常连匿名评审都不要。看国内期刊论文？短期内，国内期刊和国际高质量期刊还有很大差距。看给政府部门做的咨询报告和政策建议以及批示官员的级别？这似乎不是学术水平，而是咨询能力，或议政能力，虽然其对社会的贡献有时超过学术论文对社会的贡献。看经济散文？通常也不是匿名评审，而且这也不算是严谨的学术研究。看媒体出镜率、社会影响力？这似乎也不是学术水平高低的问题，虽然水平高的常被采访，社会影响可能也较大。——这样问下去，不难发现，在国内没有出现和国际高质量期刊相当水平期刊的情况下，没有其他更好的考核和评价学术水平的方式，虽然看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发表情况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其次，国内很多高校都想创建国际一流大学，而国际一流大学评价学者的公认标准是看其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发表情况。所以本土学者如果不发表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国内大学也没法成为国际

一流大学。从学者个人来看，如果自己是高水平的，那么除了在国际高质量期刊发表论文以外，目前也没有更好的方式向同行发送关于自己学术水平的信号。简单看一下那些既在国际又在国内期刊发表过论文的学者的自我介绍，就可以看到他们往往把国际高质量期刊写在前面。这说明，国际高质量期刊是一种相对可靠的信号。有些学者对中国问题理解很深、很透，这绝对重要，但是不把这些理解转化成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可能也不容易得到同行对其学术水平的真正认可。企业家、政府官员往往比研究人员更了解现实世界，但很难说因为对现实世界有很好的了解，他们的学术水平就高。从这个意义上讲，发表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可能是本土学者必须走的“弯路”，如果从“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探求真理”角度看这是一条“弯路”的话。

最后，可能是最重要的，重视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发表对整个国内学术界最大的好处是，它很容易区分谁在“忽悠”、谁在做学问。有人可能认为国际高质量期刊上也有“忽悠”型的论文，但这种概率远比其他方式考核和评价学者小得多。并且，在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的基础上，国际上仍有很多值得借鉴的机制比如声誉机制、同行监督等来减轻这一问题。这样，在现阶段，“盲目崇拜”国际高质量期刊，对国内学术气氛和环境的改进应该大有裨益。

两点防止误解的说明：一是这些讨论只针对财经类学科，其他学科可能不同；二是这些讨论只针对追求学术水平的学者，不针对追求社会贡献的学者。以上讨论，敬请同行指正。

徐现祥：

我认同 John Whalley 教授的判断。作为一个中国学人，如何在中国做经济学研究确实是一个很要紧的问题。这里也许根本就没有标准答案，中国的青年学者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不同的探索性答案。

一部分学者，在理论上，选择了直接把一些规范的经济学模型搬过来或适当修订，阐述中国经济的运行；在实证上，用中国数据“重复”一遍别人现有的实证工作。但也有一部分学者，致力于观察中国经济实践，基于此提出令自己好奇的问题（也许是科学的问题），通过规范的表述、论述，给出内在逻辑一致的解答，以期增进对中国经济运行的理解，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推进经济学的认知。坦白的说，我个人倾向于后一种选择，但也相信这绝对不是唯一的选择。

其实，中国几代海归经济学人也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不同的探索性答案，比如专心追求本土化；倡导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致力于纯理论研究、国际发表。毋庸置疑，海归经济学人的选择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中国目前不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如果接受了系统的现代经济学训练的海归青年学人致力于纯理论研究，直接做抽象理论出了较大成绩，那么必定形成较大的示范效应，影响甚至引领中国青年经济学人的选择。

随着中国经济现代化、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在中国，经济学科也必然是不断现代化、国际化。这是历史赋予当代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但问题是，在中国，什么是经济学的现代化、国际化呢？对这个问题，我们显然缺乏共识。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学人论文发表上，即在产品的销售上，面临国内国际两个学术市场，自然存在多

样的选择。正如贸易理论所揭示的，对于作为厂商的单个经济学人而言，是否选择出口以及何时出口，这是一个要紧的问题。一旦选择了出口，致力于在国外学术杂志上发论文，是选择产业间贸易还是产业内贸易呢？则是随之而来的系列问题。我们很难期待，在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学人对这些问题有着标准答案。

如果尝试引领中国经济学人的选择，还有必要厘清一个基本的问题，作为厂商的经济学人为什么要生产？在这个讨论的前言中，我们看到吴一平博士提出的了一个关键问题：“作为一个学者，做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金钱？虚名？推动学术进步？”对于研究的目的，文章中参加讨论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如掌握话语权，追求真理，经世济民、兼济天下，学术报国等。很难期望中国经济学人从事经济研究、学术生产的目标是单一的，如果从事经济研究的原始动力是源于满足自己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顺便解决了生存、服务社会等目标，我相信，在中国，经济学的转轨之路会更加的和谐、光明。

总之，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学人在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如何销售等问题上，缺乏共识，产生了不同的选择，甚至争吵。我个人认为，这未必是坏事情，多样的选择、以及不同选择之间的良性竞争与合作，在中国，绝对是推进经济学科现代化、国际化的一杯凉茶。

## 后 记

本文截稿之时，收到了一位教授的来信，“我读了前面的评论，大家有一些争论，这次讨论是非常好的交流平台，我觉得每个人的研究风格、方法、研究重心都有所不同，不能认为只有自己的研究是正确的与重要的，是主流的。事实上，研究的空间很大，足以容纳不同的风格、方法、研究重心，以及不同形式的研究成果，学者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偏好与优势来选择，并以谦虚的心态来相互交流，取长补短。”

感谢所有参加本次讨论的海内外学者的全力支持，他们都是在极其繁忙的工作之余来投入到这次讨论中，并对稿件的立意、结构和内容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建议。特别感谢田国强教授、John Whalley 教授、张顺明教授、代谦副教授、盛斌教授、陆铭教授、夏立军教授对成文所作的重要贡献。同时，感谢三十余位参与稿件联络、采访、翻译、整理的学者和学生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附件 1：关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 海内外学生对话

附件 2：关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 我对四个问题的回答 吴一平